

## 一位地方官員的日常勸農 ——元人王結及其《善俗要義》

許 守 泯\*

### 摘 要

中國歷朝莫不以勸農為施政重點，由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元朝也不例外。忽必烈長期治理漢地，深知農業的重要，建立元朝之後更是頒布農業詔令、建立制度與規範，這些也多為往後元朝諸帝所遵循。推廣勸農過程中，地方官更負重要責任。除了促進經濟生產，地方官對勸農有怎樣的觀念？而因為勸農，他們是否該具備農業知識？如果具備農業知識，那麼其來源為何？本文於是以元人王結（1275—1336）及其《善俗要義》為討論對象，試圖理解這些問題。

本文指出，王結上任順德路總管之後撰寫《善俗要義》作為治理依據。「善俗」的最高宗旨在於實踐儒家的價值觀，「富而教之」則是步驟，《善俗要義》前後包含了「農事」與「教化」兩部分，即傳達出此意。《善俗要義》的寫作依據，實與元代勸農的大環境相關：條列式的寫作格式與內容基調，來自元代農業綱領性文件〈勸農立社事理〉條畫；農業知識則來自於大司農司所編的《農桑輯要》。而這兩個來源都是忽必烈時代的產物，為元代勸農政策重要依據。基本上，《善俗要義》可當作地方基層版的〈勸農立社事理〉、一種操作指導手冊，也可視為是一種勸農文，而其最終目的則在於實踐儒家的價值觀。

關鍵詞：元代、王結、善俗要義、勸農立社事理、農桑輯要

---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Wang-Jie and *Shan Su Yao Yi* – A Yuan Dynasty Local Governor and His Publication to Promote Daily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Hsu, Shou-min\*

### **Abstract**

Promoting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has been the focus throughout history in Chinese ruling. There is no exception to Yuan Dynasty although it was established by nomads. Kublai, the founder of Yuan Dynasty, was aware the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e his ruling of Han land. He issued agricultural ordinance, as well as set up systems and specifications, which were applied soon after the Yuan Dynasty was established. These rules were continued by the emperors following Kublai's ruling. Promoting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was an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for local governors. But did they require any level of knowledge for carrying out this duty? What were the sources for them to obtain this knowledge? These questions were answered through this study of Wang-Jie (王結, 1275-1336) and his *Shan Su Yao Yi* (《善俗要義》)

Wang-Jie developed and published *Shan Su Yao Yi*, a simplified ruling and guiding document, to help respond to the ineffective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by Yuan Dynasty after he was appointed as governor of Shun De Lu (順德路). This document was consisted of two parts: "farming" and "enlightenment". It served as a "persuasion" to the farming community. Although it did not supply enough agricultural knowledge, it was specific enough to include key techniques. For comparison purposes, the focus of this publication was similar to the persuasive publications developed during Southern Song Dynasty but differed from those developed in Jiangnan during Yuan Dynasty. As of the background and basics of the document developed, it was found to be related to Yuan Dynasty agricultural promotions. *Shan Su Yao Yi* was a simplified and combined document with knowledge derived from *Cyuan Nong Li She Shih Li* (《勸農立社事理》), with the bullet point writing style and document preparation, and *Nong Sang Ji Yao* (《農桑輯要》), a description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developed by the Yuan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These two sources were important guides to help promote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during Kublai's ruling.

**Key words :** Yuan dynasty, Wang-Jie, *Shan Su Yao Yi*, *Cyuan Nong Li She Shih Li*, *Nong Sang Ji Yao*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壹、前言\*

中國歷代莫不以「勸農」為施政重點，由蒙古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元朝也不例外。早在忽必烈（1215—1294，1260 即位）以皇弟身分治理漢地之時，他身邊的謀士就提出「務農桑」、「重農桑」的重要。等到 1260 年忽必烈於中原建立元朝，即下詔「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sup>1</sup>強調重視農業發展。自此忽必烈所頒布有關農業的詔令、建立的制度與規範，也多為往後元朝諸帝所遵循。而在推展農業的過程中，地方官員負有重責大任，勸農是他們的日常工作之一，且元代以「戶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均」五事為考課地方官員的項目，<sup>2</sup>其中「田野闢」即為「調勸課之最，農桑墾殖，水利興修者」，<sup>3</sup>也就是勸課農桑之事，更可見其重要。

地方官員推展農業，最基本的做法當然就是執行政令。除此之外，他們也會以勸農文或勸農詩作為勸諭。但是，透過體制執行政令，或書面文字宣導，用以促進經濟生產之外，地方官員對勸農還有怎樣的觀念呢？

春秋時代，孔子回答樊遲請教農稼，說「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表示他並非農稼方面專業，但進而說明「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sup>4</sup>意即學農稼之外，還有更重要「禮」、「義」、「信」價值觀可以實踐。因此「勸農」並非以經濟生產為重而已。且由於勸農，地方官是否對農業知識該有所認識？如果他們具備農業知識，那麼其來源為何？這幾個問題或許因人而異，不過卻是可以思考與理解。

---

\* 本文通篇引文中文字下方底線為作者加注，以便讀者閱讀。

<sup>1</sup>（明）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 93，〈食貨一·農桑〉，頁 2354。

<sup>2</sup>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 6，〈選舉·五事〉，頁 259。

<sup>3</sup>今人把元代徐元瑞的《吏學指南》、胡祇適的《雜著》、張養浩的《為政忠告》以及王結的《善俗要義》收為一書並予以點校，以《吏學指南（外三種）》為書名。本文使用收入此書的《善俗要義》，以下皆以《善俗要義》稱之。這句「調勸課之最，農桑墾殖，水利興修者」出於（元）王結，《善俗要義》（收入（元）楊訥點校，《吏學指南（外三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元代史料叢刊），頁 30。

<sup>4</sup>（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85，點校本），卷 7，〈子路第十三〉，頁 142-143。

元人王結（1275—1336）擔任順德路總管時，撰寫《善俗要義》做為治理依據，內容包含了為數不多但頗為具體的農業知識以作為指導。因此，本文即以元人王結與其著作《善俗要義》為對象，探討王結於怎樣的背景之下寫出《善俗要義》；而以「善俗」為名，在勸農的實際操作之外還有何種理念，成為他的「日常勸農」。文中又以《善俗要義》的寫作背景、依據、格式，農業知識來源為主要討論方向。

本文出現的「勸農」、「務農」、「勸農桑」、「務農桑」、「勸課農桑」等詞所指涉的內容相同，包括風俗教化與農業指導。元代將「農」、「桑」的二字合併，表示將「桑」提到與「農」同等的地位，說明了蒙古統治者對於華北地區植桑養蠶的極力提倡，<sup>5</sup>但本文的「農桑」一律以「農事」視之，著重於農業知識，不會特意探討「桑」的問題。

## 貳、經歷

王結，字儀伯，元代保定路易州定興人，後來遷至真定路中山府，皆位於今日河北。王結的生平事蹟，元人蘇天爵（1294—1352）所撰〈元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王公行狀〉可供為主要參考，<sup>6</sup>以下簡單介紹。

金朝末年，王結一位公伯祖，率鄉民投降蒙古，獲管領中山地區人匠。可知王氏在地方上應頗具勢力，能夠主導投降之事而受封於蒙古。王結的祖父王逖勤，以質子身分隨成吉思汗西征，娶妻蒙古阿魯渾氏；父親王德信，則以治縣有聲，擢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這裡「治縣」之處也許是指所管領的中山地區。但王德信與臺臣意見不合，四十多歲時棄官不仕。總體來說，王氏最初因為投降蒙古而獲得職務，之後子孫亦為蒙古效力。由此看來，王氏雖然不是明顯的「漢軍世侯」，但亦因投降蒙古而與蒙古政權有所連結，算是有小小的背景。

<sup>5</sup> 石聲漢，《石聲漢農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35。

<sup>6</sup>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點校本），卷23，〈元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王公行狀〉，頁383-387。以下簡稱〈王公行狀〉。《元史》卷178王結有傳，乃根據〈王公行狀〉而來。

只不過父親的棄官，似乎斷了王結的仕宦機會。因此，如同元朝的漢族士人往往到大都尋求出仕機會的風氣一樣，<sup>7</sup>王結在二十多歲時曾經游歷大都，據稱其言論受到名人權貴的注意，「皆聳聽畏服」。不僅如此，王結更針對朝政提出〈上中書宰相八事書〉，八事為：「一曰立經筵以養君德」，「二曰行仁政以結民心」，「三曰育英材以備貢舉」，「四曰擇守令以正銓選」，「五曰敬賢士以厲名節」，「六曰革冗官以正職制」，「七曰辨章程以定民志」，「八曰務農桑以厚民生」。<sup>8</sup>

此時正值成宗鐵穆耳（1265－1307，1295 即位）在位，中書右丞相為完澤（1246－1303）。王結謙稱自己「一介疏賤，上書相府、妄言政事，不待賈而售、不待問而告」，但「又似乎干名躁進之人」，同時表明自己上書之舉，乃君子「處畎畝而不忘天下之憂，得位則行其道，不得位則修其辭，言行道亦行也」。<sup>9</sup> 因此可以想見，王結藉由新朝新氣象而自我推薦，其大都之遊的確有備而來。只可惜此番建言沒有受到採用。不過，王結的表現終究受到注意，於是有人把他推薦給愛育黎拔力八達（1285－1320，1312 即位）——也就是後來的仁宗，擔任宿衛。元朝的宿衛軍有怯薛和衛軍兩個不同組織，都是帝王個人世襲財產的重要部分，擔任宿衛則成為入仕的捷徑，所以對他來說是很不錯的出仕機會。而進入宿衛組織必須有一定的資格，這也顯示王結家世具備這樣的條件。<sup>10</sup> 王結的工作，包括收集歷代可為借鏡的君臣言行，每日提供給愛育黎拔力八達作為治國參考，因此所擔任的或為怯薛之職。

大德十一年（1307）春天，成宗駕崩，隨即引發政治鬥爭，最後由海山（1281－1311，1307 即位）與愛育黎拔力八達這對兄弟奪得政權。武宗海山即位，立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而王結則被命為典牧太監，這是王結第一個官職，應是受到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推薦。等到仁宗登基，遷王結為集賢學士，出為順德路總管，之後歷官揚州路（江蘇）、東昌路（山東）。

<sup>7</sup> 參考丁崑健，〈從仕宦途徑看元代的游士之風〉，收入蕭啟慶編，《蒙元的歷史與文化——蒙元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頁 635-653；申萬里，〈理想、尊嚴與生存掙扎——元代江南士人與社會綜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77-117。

<sup>8</sup> （元）王結，〈上中書宰相八事書〉，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 31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 1 版第 1 次印刷），卷 1005，頁 328-335。另外，本文亦使用四庫全書本的（元）王結，《文忠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sup>9</sup> （元）王結，〈上中書宰相八事書〉，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 31 冊，卷 1005，頁 334-335。

<sup>10</sup> 蕭啟慶，《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頁 61-63。

仁宗過世，其子英宗碩德八剌（1303—1323，1321 即位）繼任，以拜住（1298—1323）為相，徵用舊人，至治二年（1322）召王結為參議中書省事，不久除吏部尚書。至治三年（1323）發生南坡之變，英宗、拜住被殺。泰定帝也孫鐵木兒（1293—1328，1324 即位）即位，泰定元年（1324）科舉以王結為讀卷官，遷集賢侍讀學士，領經筵，扈從上都。次年除浙西道廉訪使，以疾還。一年後拜遼陽行省參知政事，再召刑部尚書。1328 年泰定帝病逝，發生慘烈的上都、大都兩都大戰。天曆元年（1328）武宗之子圖帖睦爾（文宗，1304—1332）先行登基，表示這是權宜措施，之後將讓位給其兄和世琜（明宗，1300—1329，1329 即位）。王結則出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改同知儲慶使司事。天曆二年（1329）正月拜中書參知政事，以親老辭。也就在這月，明宗即帝位於和林之北，立文宗為皇太子，兄弟兩人八月初一會合於旺忽察都，初六明宗暴斃。文宗再登帝位（1329），王結遂罷政。不久命王結為集賢侍讀，但以丁內艱不起。

文宗之後，七歲的寧宗懿璘質班（1326—1332，1332 即位）繼任三個月即病故，隨後由順帝妥歡貼穆爾（1320—1370，1333 即位）接任。元統元年（1333），再以王結為浙西廉訪使，未行。再召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二年（1334），拜中書左丞。至元元年（1335）春，知經筵事，九月以疾去位。二年（1336）春正月，薨於中山私第，年六十二。

綜觀王結的仕宦過程，他渡過了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宗七朝，以及順帝初數年；經歷了政治上「成武授受」、「武仁之爭」、「南坡之變」、「兩都大戰」、「旺忽察都之變」五次現實殘酷的政治鬥爭。王結在這五次政治鬥爭的立場，當然不會明顯的出現在蘇天爵所寫的〈行狀〉中，吾人無從得知王結面對這些政爭的意見，但身為仁宗的人馬，對於弑殺仁宗之子英宗背後的嫌疑人泰定帝，以及弑兄（明宗）的文宗，王結在不同時期以疾病、親老、丁內艱因素辭官的行為，或許多少可以揣想他的態度。

以上的介紹，除了說明王結的仕宦經歷，也可看到即使處於元廷經常性的紛擾局勢之下，王結仍能從中央到地方不斷任官的事實。王結之所以能夠如此，除了身家背景的依憑，可以推想他應具有一定程度的從政能力。至於王結仕宦中可能牽涉農業知識的職務，他的第一個官職典牧太監或者多少需要。典牧監，秩正三品，其

下設有太監、少監、丞，經歷、知事、照磨，掌管繁殖牲畜之事。<sup>11</sup> 而王結首次擔任的地方官為順德路總管，即寫下《善俗要義》作為勸農的依據，加上之後繼續任職揚州路（治所江都縣，今江蘇揚州市）、<sup>12</sup>東昌路（治所聊城縣，今山東聊城市），<sup>13</sup>可說是他仕宦經歷之中與勸農工作連結最為密切的職務。因為相對於其他官職，例如參議中書省事（點左右司文牘）、<sup>14</sup>吏部尚書（掌天下官吏選授之政令）、<sup>15</sup>刑部尚書（掌天下刑名法律之政令）、<sup>16</sup>讀卷官、集賢學士、集賢侍讀學士（集賢院，掌提調學校、徵求隱逸、召集賢良，凡國子監、玄門道教、陰陽祭祀、占卜祭遁之事，悉隸焉）、<sup>17</sup>同知儲慶使司事（儲政院，備左右輔翼皇太子之任），<sup>18</sup>中書參知政事（副宰相以參大政）、中書左丞（副宰相裁成庶務），<sup>19</sup>這些都屬中央官職，與地方的勸農事務較有距離。至於地方的行省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掌國庶務，統郡縣，鎮邊鄙，與都省為表裏），<sup>20</sup>以及廉訪使（監察），亦能與地方勸農有所聯繫。尤其廉訪使與勸農政策的關係後文將會提及。

那麼，王結《善俗要義》是如何寫成的呢？以下繼續探討。

## 參、《善俗要義》的完成

### 一、成書與動機

仁宗即位，王結從牧典太監遷集賢學士，之後出任順德路總管府。順德路位於腹裏中書省，今河北太行山以東一帶，領有錄事司一、九縣，分別是邢臺、鉅鹿、內丘、平鄉、廣宗、沙河、南和、唐山、任縣，治所邢臺（今河北邢臺市），約三

<sup>11</sup>（明）宋濂等，《元史》，卷 89，〈百官五〉，頁 2245。

<sup>12</sup>（明）宋濂等，《元史》，卷 59，〈地理志二〉，頁 1414。

<sup>13</sup>（明）宋濂等，《元史》，卷 58，〈地理志一〉，頁 1366。

<sup>14</sup>（明）宋濂等，《元史》，卷 85，〈百官一〉，頁 2122。

<sup>15</sup>（明）宋濂等，《元史》，卷 85，〈百官一〉，頁 2125-2126。

<sup>16</sup>（明）宋濂等，《元史》，卷 85，〈百官一〉，頁 2142。

<sup>17</sup>（明）宋濂等，《元史》，卷 85，〈百官三〉，頁 2192。

<sup>18</sup>（明）宋濂等，《元史》，卷 85，〈百官五〉，頁 2243。

<sup>19</sup>（明）宋濂等，《元史》，卷 85，〈百官一〉，頁 2121-2122。

<sup>20</sup>（明）宋濂等，《元史》，卷 91，〈百官七〉，頁 2305。

萬多戶，十二萬四千餘口，屬於下路。<sup>21</sup> 下路總管府為從三品之職。<sup>22</sup> 順德路正當太行山斷麓，軍事可據可守，地形則諸嶺聳立，非沃野平原；<sup>23</sup> 雖有河流但不通運河，所以無漕運之利而僅資灌溉之效。<sup>24</sup> 看來對經濟發展不甚有太大助益。風俗則淳厚近古風，百姓多能勤於農桑。<sup>25</sup>

〈行狀〉中提到王結擔任順德路總管府的表現，相當簡要：

郡久不治，公下車教民務農興學，孝親弟長，輯姦禁暴，悉登于書，俾民朝夕閱習。久之，郡政大治。

這裡的「悉登于書」之「書」即指《善俗要義》。也就是說王結把「務農興學，孝親弟長，輯姦禁暴」的指導方針寫成文字，讓人民不斷習作而達到治理成效。史稱王結著有詩文十五卷，已經散佚，清代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文忠集》六卷，一到三卷為詩，四到六卷為文，第六卷即《善俗要義》，<sup>26</sup>不過無法確定《善俗要義》是否原本就包括在十五卷詩文中。今人編輯「元代史料叢刊」，將王結《善俗要義》、徐元瑞《吏學指南》、胡祇遹（1227—1295）《雜著》以及張養浩（1270—1329）《為政忠告》合為一書，認為這四種撰著性質雖然不盡相同，但都可歸類於「政書」一類。<sup>27</sup>

王結為何創作《善俗要義》？根據《善俗要義》前段所錄的官方牒文指出：自世祖忽必烈以來，諸帝每每頒布詔書聖旨，訓飭為官之人務必遵行「勸課農桑，興舉學校，宣明教化，肅清風俗」的職責，所以王結遵從旨意，取古人「富而教之」之意，擬定三十三條可供下級單位與人民行事的條例，名之為《善俗要義》，期望確切達到「勸農桑，正人倫，厚風俗，遠刑罰」的成效。其實，至大四年（1311）仁宗即位，三月十八日頒布了「振朝綱」、「飭官吏」、「守法令」、「求直言」、「興學校」、「勸農桑」、「撫軍士」、「重民疾」、「恤站赤」、「抑奔競」、「止貢獻」、「均賦役」

<sup>21</sup> （明）宋濂等，《元史》，卷 58，〈地理志一〉，頁 1358-1359。

<sup>22</sup> （明）宋濂等，《元史》，卷 91，〈百官七〉，頁 2311。

<sup>23</sup> （清）徐景增修纂，《順德府志》（收入《雕龍中日古籍全文資料庫》，臺北，大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2014，清乾隆十五年刻本），卷 2，〈山川〉，頁 11a。

<sup>24</sup> （清）徐景增修纂，《順德府志》，卷 2，〈山川〉，頁 25b。

<sup>25</sup> （清）徐景增修纂，《順德府志》，卷 6，〈風俗〉，頁 9a-9b。

<sup>26</sup> （元）王結，《文忠集》，〈提要〉，頁 1a-1b。

<sup>27</sup> （元）楊訥點校，《吏學指南（外三種）》，「點校說明」，頁 1。



十二條施政方針。<sup>28</sup> 身為仁宗提攜之人，王結所為也可說是響應了仁宗的旨意。

於是，《善俗要義》由總管府繕寫成帙，「合行移關請照驗」，即經過審核准予刊行，<sup>29</sup>發給下級單位依樣抄錄，提醒郡守縣令的職責不是只有「辦賦稅、理詞訟」，還要「課耕桑以厚民生，明教化以正民俗」，才是朝廷委任之意，所以須將《善俗要義》從府、縣層層下達，並且要求「正官、教官、社長、社師人等」按此條例進行宣導，若有不遵從者，依法懲治。<sup>30</sup> 其中「社長」、「社師」是元代社會基層組織「農村社制」的設置，社眾推舉年高通曉農事者為「社長」，專務勸農；每社設立學校一所，選擇通曉經書者為學師，即社師。元朝「社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督導農業，在於恢復和推進農業生產。<sup>31</sup> 所以《善俗要義》下達到「社」的單位，是必然的要求。

「課耕桑以厚民生，明教化以正民俗」，這是要求地方官盡其職責的老生常談，看來甚無特殊。不過，也就是這樣不斷呼籲的老生常談，反映了「如何能夠確實治理地方」一直是地方官員最基本且非常關心的問題。因此除了呼應仁宗即位的宣示，如何達到落實地方治理，應該也是王結提出《善俗要義》的動機之一。

王結先是擔任順德路總管，後來遷揚州路、東昌路，直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召為參議中書省事，因此其擔任地方官約莫十年時間。<sup>32</sup> 想必《善俗要義》不會只運用在順德路而已；在位居水陸要衝的揚州路，王結「務在里民，送往迎來，非所先也」；在容易水患的東昌路「疏為斗門，以走潦水，民使得良田佃作」，「又新學宮，以延士子願學者」，<sup>33</sup>這些都可說是「務農興學」的作為。

<sup>28</sup> （元）仁宗，〈登寶位詔〉，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36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1版第1次印刷），卷1138，頁29-33。

<sup>29</sup> 田建平，《元代出版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1。說到元代官方圖書的出版，都要呈請中書省批准，並由中書省以「牒」或通知具體管理部門或諸路，才許刊行。

<sup>30</sup> （元）王結，《善俗要義》，（元）楊訥點校，《史學指南（外三種）》，頁343-344。

<sup>31</sup> （元）楊訥，〈元代農村社制研究〉，《元史論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頁1-29；中島樂章，〈元代社制の成立と展開〉，《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29號（2001），頁119-146。

<sup>32</sup> 這裡假設王結於仁宗皇慶元年（1312）從集賢直學士出為順德路總管開始計算，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召為參議中書省事，大約十年。

<sup>33</sup>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卷23，〈王公行狀〉，頁384。

## 二、宗旨與內容

王結以《善俗要義》為名，從字面上看，「善俗」為改善、提升風俗之意。而《易經》「漸」卦：「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孔穎達疏曰「君子求賢，得使居位，化風俗使清善」，<sup>34</sup>因此或者可以延伸「善俗」為：君主求得賢人，使他們居其位而能夠善俗。前言提到孔子把「禮」、「義」、「信」的價值放在農稼之前，這正是地方官善俗的宗旨。另外，孔子與子貢的一段對談，也說明了為政首重之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sup>35</sup>

孔子認為從政的要點在於確保豐衣足食、軍事強大以及獲得人民的信任。但是必須有所選擇的時候，則以民信為最。朱熹（1130—1200）對這段話的註解，說道：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  
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sup>36</sup>

可知，為政者本身要有信，同時也要教導人民有信。儒家所注重的價值乃為政之首。因此，從《善俗要義》一詞，當可理解王結對於治理地方的理念，在於實踐儒家的價值作為治理地方的終極目標。而從《善俗要義》的內容，也可看到這樣的安排。

《善俗要義》全文共三十三條例。筆者依照〈行狀〉所言王結上任順德路總管「教民務農興學，孝親弟長，輯姦禁暴」的作為，把這三十三條例略分為「農事」與「教化」兩類。「農事」指廣義的「農漁業生產」，包括耕作、養殖、生產以及與農耕關係密切的水利建設、糧食貯存等等。「教化」的範圍也很廣，包含如何實踐綱常倫理、發揚善良風俗，相當於「孝親弟長」與「輯姦禁暴」的範圍。可以說，

<sup>34</sup> （三國）王弼，《周易注疏》（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周易兼義下經夬傳卷第五，最後檢索日期：2020年2月5日。

<sup>35</sup>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卷6，〈顏淵第十二〉，頁134-135。

<sup>36</sup>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卷6，〈顏淵第十二〉，頁135。

「教化」一類就是「禮」、「義」、「信」等儒家價值的實踐，「農事」一類就是「足食」。

《善俗要義》三十三條例名目依次如下：

一曰務農桑，二曰課植栽，三曰廣儲蓄，四曰育牝牴，五曰畜雞豚，六曰養魚鴨，七曰興水利（防水患附），八曰殖生理，九曰治園圃，十曰辦差稅（軍站錢附），十一曰聚義糧。

以上一到十一條為筆者所區分的「農事」類。「教化」類則有二十二條：

十二曰勤學問，十三曰敦孝悌，十四曰隆慈愛，十五曰友昆弟，十六曰合夫婦，十七曰別男女，十八曰正家室，十九曰尊長官，二十曰親師儒，二十一曰睦宗族，二十二曰敬耆艾，二十三曰正婚姻，二十四曰致勤謹，二十五曰澤交游，二十六曰振饑餒，二十七曰恤鰥寡，二十八曰息鬭訟，二十九曰禁賭博，三十曰弭盜賊，三十一曰明要約，三十二曰罷祈享，三十三曰戒游惰。

若再進一步劃分，第十二條到第二十一條，筆者將之歸於「綱常倫理」，其中隱約可見「個人到群體」與「親疏遠近」的排列。第二十二條到最後第三十三條則歸之於「善良風俗」。「教化」類條例為「農事」類的兩倍，可以認為這正是顯示了儒家價值的重要。

三十三條例的構成，每一條除了名目外，還有一段主要內容。以第一條為例，其呈現如下：

一曰務農桑

夫治國之道，養民為本；養民之術，務農為先。蓋人生所資，惟在五穀布帛，所以累奉條畫，勸民敦本抑末，勸修農業者，以此故也。然聞所在民眾通曉農務、勤力耕桑者不為無人，其苟且之徒未盡地利，游墮之輩荒廢本業者，亦多有之。今後仰社長勸社眾常觀農桑之書，父兄率其子弟，主戶督其田客，趁時深耕勻種，頻併鋤耨，植禾藝麥，最為上計。或風土不宜，雨澤遲降，合晚種雜田瓜菜者，亦可併力補種，更宜種麻以備紡績。蠶桑之事，自收種、浴川、

生蛾、餵飼以至成繭繰絲，皆當詳考農書所載老農遺法，尊而行之。家長率一家男女勸用心用力，四十日間千繫一年生計。若婦人得閒，伏中便可織絹沉蜜，勝似餘月。如此上可以辦納差稅，下可以一家溫飽。苟有蓄積，雖遇凶年，亦免飢寒之患也。<sup>37</sup>

其餘三十二條都是這種寫作格式。第一條「務農桑」可以說是以下條例的總綱，首句「夫治國之道，養民為本；養民之術，務農為先」正是前言提到忽必烈即位詔告天下「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的複製。

另外，從王結對三十三條例的順序安排，可知「農事」與「教化」先後的關係，正是牒文提到王結取「古人富而教之」之意。孟子說古代聖人：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sup>38</sup>

也說：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sup>39</sup>

因此，為了使百姓有「恆心」，必須先使其有「恆產」，而最終、最重要的目的則是使百姓能夠實踐禮、義、信等價值觀，也就是子貢問為政，孔子對足食、足兵與民信的順序選擇。

那麼如何使百姓有「恆產」、「足食」？孟子建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這就是農事；接著又說「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養」，這就是教化。<sup>40</sup> 朱熹註解這段話：

<sup>37</sup> （元）王結，《善俗要義》，（元）楊訥點校，《史學指南（外三種）》，頁344。

<sup>38</sup>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卷5，〈滕文公章句上〉，頁259。

<sup>39</sup>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卷5，〈滕文公章句上〉，頁254。（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卷1，〈梁惠王章句上〉，頁204。也有類似的話語：「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朱熹注曰：「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

<sup>40</sup>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卷1，〈梁惠王章句上〉，頁204。

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sup>41</sup>

因此可以說，衣食足而後治禮義，此是謂「善俗」。

前文已經提到，王結因擔任順德路總管之職而寫出《善俗要義》，換言之，這是他因應職責所需的產物：一方面呼應元廷對地方官員的勸農要求，一方面實踐儒家價值所在。那麼，王結如何寫出這三十三條例呢？特別是前面十一條「農事」內容，寫得相當具體。以下即針對《善俗要義》的寫作格式與「農事」條例的農業知識來源進行分析。至於「教化」條例內容可視為儒家禮、義、信等諸多價值觀的具體化陳述，因此不多贅言。

## 肆、寫作格式與農業知識來源

### 一、寫作格式

#### （一）與〈上中書宰相八事書〉的比較

王結遊大都所呈〈上中書宰相八事書〉中有關農事的部分，是第八事「務農桑以厚民生」。由於閱讀對象為宰相，目的在於建言，同時也希望獲得賞識，因此〈上中書宰相八事書〉的寫作方式基本上採取「提綱挈領」的寫法。第八事「務農桑以厚民生」內容如下：

八曰務農桑以厚民生。今疆宇至廣，生齒日繁，然物益貴，衣食日蹙，轉徙日多，不幸凶年，饑殍滿路。原其所由，蓋耕者少而食者多，公私各無儲蓄，上下奢侈，用度不節故也。救之之術，當驅游惰，歸之南畝。優重農民，勿令擾害。州縣官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文移堆積，上下相蒙。今宜慎選良吏，准酌農書，歲課種樹，責其成效，不為虛文，行之久遠，庶幾有益。更考隋唐

<sup>41</sup>（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卷1，〈梁惠王章句上〉，頁204。

之法，各路立常平倉，官置本錢，兼儲米粟布帛絲麻之類，賤則加價而收之，貴則下價而出之。今廉訪司官提舉檢察，糾其不如法者。如此則雖水旱為災，而物價不騰貴矣。國家又當崇尚節儉，賞與有節，用度有經。省營繕之役，賤奇巧之服。則穀帛可賤，財用可豐，饑饉可備，民生厚而國力愈強矣。<sup>42</sup>

這段文字主要對於近來凶年卻無法改善民生的現象提出解釋與建議，重點仍在於必須貫徹務農：包括地方官的勸農必須落實，要有良吏與農書的配合，也要有經常性的農事設置與管理方式，並確切進行監察工作，而統治者也必須做為表率。可以說，王結觀察到長期以來勸農有名無實導致成效不彰的現實狀況。至於如何改善，此處提的是大原則的建議，並未述及農業知識。

到了《善俗要義》，由於閱讀者或使用者的下級單位至一般百姓，希望達成提高經濟生產的實效，因此其中有關「農事」部分則更為具體。以下條例即與農業知識相關：

#### 「二曰課栽植」條

……然栽種之法，其種〔榘〕移栽、壓條、接換，效驗已著，苟能按其成法，多廣栽種，則數年之間絲絹煩勝亦如齊魯矣。如地法委不相宜，當栽植榆、柳、青白楊樹，十年之後，枝梢可為柴薪，身幹堪充梁柱，或自用，或貿易，皆為有益之事。其附近城郭去處，當種植雜果貨賣，益資助生理之一端也。……

#### 「四曰育牝牯」條

陶朱公〔曰〕：「欲速富，養五牯。」如各縣鄉有宜畜牧去處，仰有力之家多養牯牛、母羊，隨時放牧，如法柵圈。養育得所，孕字必多，牛供耕作，羊堪貨賣，剪毛飲酪，皆為利益。善於治生，所宜斟酌遵行也。

#### 「五曰蓄雞豚」條

孟子曰：「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且五牯之中，雞豚易置。豬種取短嘴無柔毛者良，若近山林，宜多豢養放牧。雞種取桑落時生者良，

<sup>42</sup>（元）王結，〈上中書宰相八事書〉，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31冊，卷1005，頁334。

一雄可將四五牝雞籠內著棧，如法畜養。如此則雞豚蕃息，上可以供老者之養，下可以滋生理之事也。

「六曰養魚鴨」條

陶朱公曰：「治生之法，水畜第一。」仰附近河渠有地有力之家，疏鑿池沼，中溜洲渚，求懷子鯉魚及牡鯉魚納於其中，二年之後，其利無窮。鴨尤易養，無所不食，水傍育之，滋孕蕃息。更有可栽種蓮藕、蒲葦、菱角、雞頭去處，亦仰多廣栽植，亦治生良法也。

「九曰治園圃」條

……今農民雖務耕桑，亦當於近宅隙地種藝蔬菜，省錢轉賣。且韭之為物，一種即生，力省味美，尤宜多種。其於瓜、茄、蔥、蒜等物，隨宜栽植，少則自用，多則貨賣。如地畝稍多，人力有餘，更宜種芋及蔓菁、苜蓿，此物收數甚多，不惟滋助飲食，又可以救饑饉度凶年也。<sup>43</sup>

其中「四曰育牝牡」條，或可與王結擔任典牧太監的工作有關。從以上所列，可見《善俗要義》「農事」內容包括栽種技術、養殖、選種，以及如何治生等等，都是相當具體的農業知識。

至於與農業相關的水利，《善俗要義》僅有一條「七曰興水利」，寫到王結觀察順德路轄下縣治邢臺、南和、任縣的耕作狀況，而提出如何改善水利，諸如「旱乾引水灌溉，霖雨開堰疏放」、「引溝渠澆灌稻田」、「鑿渠引水」、「造水車」、「修堤防」等等，<sup>44</sup>並提到這些方式：

皆江淮已驗良法，條畫許令舉行，雖南北風土不同，亦有可為之處。<sup>45</sup>

所謂「江淮已驗良法」應指元初對江淮流域的水利建設，包括運河修浚，整治芍陂、揚州五塘，以及建設對當地能發揮灌溉作用的地方小型陂塘。<sup>46</sup>意即，王結

<sup>43</sup> (元)王結，《善俗要義》，(元)楊訥點校，《史學指南(外三種)》，頁345-349。

<sup>44</sup> (元)王結，《善俗要義》，(元)楊訥點校，《史學指南(外三種)》，頁347-348。

<sup>45</sup> (元)王結，《善俗要義》，(元)楊訥點校，《史學指南(外三種)》，頁348。

<sup>46</sup> 潘清，〈元代江淮流域水利建設述論〉，《學術研究》，第12期(2014)，頁105-111。

以已經具有成效的江淮水利建設，提供轄下縣治做為治水參考，而其中又當以地方型的水利灌溉更為實用。這點與前文曾提到順德路的河流「無漕運之利而僅資灌溉之效」相關，因此水利重點在於加強灌溉的效用。

有別於〈上中書宰相八事書〉第八事「務農桑以厚民生」那種綱要式的寫法。這種具體，筆者認為《善俗要義》對於農事具有「操作指導手冊」的性質。此外，這種條例式的寫法，也可與勸農文的寫作格式作為對比。

## （二）與「勸農文」的比較

中國歷代重視農業，為了鼓勵與促進農業生產，統治者透過各種途徑向民眾傳遞注重農事的訊息，因此出現各種勸農的文類，諸如詔令、文、詩、戲曲等。<sup>47</sup> 其中勸農文尤盛於宋代。從北宋後期到南宋，州縣官每年仲春望日（二月十五日），集合地方父老出郊勸農；出郊勸農之時還須作勸農文一首，向父老宣讀，各處張貼，學者認為此實為提示國家統治正當性的機能設置。<sup>48</sup> 寫勸農文的作法也延續到元代，尤其江南地區因為地方官巡行勸課反而造成騷擾百姓，於是至元二十九年（1292）以勸農文取代了巡行勸課並予以制度化。不過華北地區地方官的巡行勸課則依然存續。<sup>49</sup> 另外，從數量上看，宋代所留下的勸農文幾乎是南宋的作品，有學者統計大約一百餘篇，<sup>50</sup>元代的勸農文則很少，<sup>51</sup>這不能排除與資料遺佚有關，不過就現存資料相對而言，元代的確少了許多。

以下從筆者檢閱《全元文》所收錄的十五篇勸農文中，<sup>52</sup>選取宋末元初陸文圭

<sup>47</sup> 徐燕琳，〈勸農文學：一種值得注意的文學體類〉，《學術研究》，第6期（2011），頁153-158。

<sup>48</sup> 宮沢知之，〈南宋勸農論—農民支配のイデオロギ—〉，中國史研究會編，《中國史像の再構成—國家と農民—》（京都：文理閣，1983），頁215-253；包偉民、吳錚強，〈形式的背後：兩宋勸農制度的歷史分析〉，《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1期（2004），頁39-41。

<sup>49</sup> 伊藤正彥，〈元代勸農文小考——元代江南における勸農の基調とその歴史的位置〉，《熊本大學文學部論叢·史學編》，第49號（1995），頁5-7。

<sup>50</sup> 宮沢知之，〈南宋勸農論—農民支配のイデオロギ—〉，頁215。

<sup>51</sup> 伊藤正彥，〈元代勸農文小考——元代江南における勸農の基調とその歴史的位置〉，頁9。

<sup>52</sup> 這15篇分別為：（元）王惲，〈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6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第1版第1次印刷），卷195，頁575-578，其後還有〈勸農詩〉；（元）陸文圭，〈勸農文〉兩篇、〈戊辰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17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第1版第1次印刷），卷567，頁724-726；（元）唐元，〈本路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24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第1版第1次印刷），卷764，頁433-434；（元）黃潛，〈諸暨州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30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1版第1次印刷），卷986，頁528-530；（元）葉峴，〈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37冊（南京：鳳凰出版



(1252—1336)所撰的〈勸農文〉為例說明寫作格式。

《全元文》收錄陸文圭〈勸農文〉三篇，前兩篇皆名〈勸農文〉，第三篇則是〈戊辰勸農文〉，每篇都提到每年二月州縣官出郊勸農的行為：

每歲仲春，勞農於東郊，此古之禮而朝廷之令典也。州縣長官以勸農事三字繫之職銜之下，於事為重。……句容一小邑，……縣官率其屬以延見父老，非為文具，務敦實業。……

農，重事也。州縣官以勸農二字繫銜。每歲春月，延見父老於東郊，誠之農事，禮也。

暨陽一小州，……二月初吉，田事載興，長官親出東郊勸耕，雖循舊典，亦欲延見父老，巡省田里。……<sup>53</sup>

〈戊辰勸農文〉的「戊辰」為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由此這三段引文可知為元代地方官仍延續宋代出郊勸農的儀式。陸文圭是江陰（江蘇）人，宋度宗咸淳初年十八歲之時以《春秋》中鄉試。宋亡（1279）隱居城東。入元，於仁宗延祐元年（1314）中鄉試，赴京參加會試失利；七年（1321）再中鄉試，但是沒有繼續參加會試。陸文圭在元朝並無任何官職，只有泰定三年（1326）應聘為容山縣學，<sup>54</sup>所以這三篇勸農文應是為地方官員的代筆之作。至於寫作格式，以第二篇相對較短的〈勸農文〉為例：

---

社，2004，第1版第1次印刷），卷1161，頁77-78；（元）郭應木，〈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38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1版第1次印刷），卷1206，頁554-555；（元）陳謨，〈興國勸農文〉、〈韶州府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47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1版第1次印刷），卷1454，頁313-314；（元）王穀，〈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49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1版第1次印刷），卷1499，頁203-204；（元）唐桂芳，〈湘陰州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51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1版第1次印刷），卷1587，頁734；（元）殷奎，〈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57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1版第1次印刷），卷1756，頁768；（元）朱模，〈六安州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58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1版第1次印刷），卷1765，頁94-95；（元）朱子範，〈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59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1版第1次印刷），卷1810，頁395。

<sup>53</sup> （元）陸文圭，〈勸農文〉一、〈勸農文〉二，〈戊辰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17冊，卷567，頁724-726。

<sup>54</sup> 這段簡歷，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17冊，卷560，頁425，「陸文圭」簡傳。

農，重事也。州縣官以勸農二字繫銜，每歲春月，延見父老於東郊，誠之農事，禮也。夫水旱之不時，此天數也。堤防必築，以泄水患。陂塘必浚，以通水利，修水旱之備也。人事不盡，諉之天時，爾農所以重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桑，或受之寒，衣食不足而有饑寒之患，則不肖之心生。爾農戒之哉！古書有之，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服字有用力之意，力字有勤勞之意。不用力、不勤勞，即是惰農，惰農安有秋成之望？繼自今父訓其子，兄詔其弟，妨農之事，一切不為，毋游手好閒，毋沉酗於酒，毋好勇犯上，毋不孝不友。有一於此，官有常刑。此又爾農所當勸者，其敬聽吾言，毋忽。<sup>55</sup>

陸元圭是由宋入元之人，他的勸農文是短文格式。筆者以「勸農文」一詞，檢索「中國基本古籍庫」中所見的宋代勸農文約八十五篇左右，多為短文格式。其中見到陳傅良（1038—1203）有一篇、朱熹（1130—1200）有二篇勸農文和《善俗要義》一樣是條列式寫法。<sup>56</sup> 元代部分的檢索，則有六篇，都是短文格式。而查閱《全元文》的十五篇勸農文中，一篇為條列式寫法；十四篇是短文格式，十四篇的十三篇作者為南人，一人不詳（見表一）。因此，陸元圭（南人）的短文寫法承續南宋而來，理論上應不至於有太大問題，同時也可與上述所言江南地區勸農文制度化的現象有所呼應，例如寫作格式一致。至於十五篇中只有一篇的寫作格式與其他十四篇不同，那就是北人王恽（1227—1304）的勸農文。

<sup>55</sup> （元）陸元圭，〈勸農文〉二，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17冊，頁725-726。

<sup>56</sup> 《中國基本古籍庫》檢索到（宋）陳傅良的〈桂陽軍勸農文〉出自其《止齋文集》，四部叢刊景明弘治本，卷43（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0年3月4日；以及（宋）朱熹的兩篇〈勸農文〉，出自（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景明嘉靖本，卷99、100（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0年3月4日。

姓名	籍貫	北/南人	勸農文格式	篇數
王惲(1227-1304)	汲縣(河南)	北人	條列	1
陸文圭(1252-1336)	江陰(江蘇)	南人	短文	3
唐元(1269-1349)	歙縣(安徽)	南人	短文	1
黃潛(1277-1357)	義烏(浙江)	南人	短文	1
華峴(1269-?)	青田(浙江)	南人	短文	1
郭應木(不詳)	資中(四川)	南人	短文	1
陳謨(1306-1401)	泰和(江西)	南人	短文	2
王毅(1303-1354)	龍泉(浙江)	南人	短文	1
唐桂芳(1308-1381)	歙縣(安徽)	南人	短文	1
殷奎(1332-1368)	崑山(江蘇)	南人	短文	1
朱模(不詳)	休寧(安徽)	南人	短文	1
朱子範(不詳)	不詳	不詳	短文	1
總計		總計	總計	總計
12 人		北人 1 人；南人 10 人； 不詳 1 人	條例 1 篇 短文 14 篇	15 篇

【表一】《全元文》中勸農文十五篇

資料來源：(元)王惲，〈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6冊，卷195，頁575-578，其後還有〈勸農詩〉；(元)陸文圭，〈勸農文〉兩篇、〈戊辰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17冊，卷567，頁724-726；(元)唐元，〈本路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24冊，卷764，頁433-434；(元)黃潛，〈諸暨州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30冊，卷986，頁528-530；(元)葉峴，〈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37冊，卷1161，頁77-78；(元)郭應木，〈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38冊，卷1206，頁554-555；(元)陳謨，〈興國勸農文〉、〈韶州府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47冊，卷1454，頁313-314；(元)王毅，〈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49冊，卷1499，頁203-204；(元)唐桂芳，〈湘陰州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51冊，卷1587，頁734；(元)殷奎，〈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57冊，卷1756，頁768；(元)朱模，〈六安州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58冊，卷1765，頁94-95；(元)朱子範，〈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59冊，卷1810，頁395。

王惲是衛州汲縣（今河南衛輝市）人，中統二年（1261）任翰林修撰、同知制告，兼國史院編修官，尋兼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治錢穀，擢材能，議典禮，考制度，咸究所長，同僚服之」，<sup>57</sup>他一生著述豐富，對元初的制度與朝政有相當多的記載，提供後人對於這段時期政治發展的認識。王惲〈勸農文〉寫作格式可以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小段前文；中間第二部分列出十三條條例，但是沒有標題；最後第三部分為一小段結束文。整篇〈勸農文〉之後又附有〈勸農詩〉。第二部分的十三條內容和《善俗要義》一樣，包括了「農事」以及「教化」兩部分。「農事」部分例如第一條：

如田多荒蕪者，立限墾闢，以廣種時。其有年深墾薄者，教之上糞，使土肉肥厚，以助生氣，自然根本壯實，雖遇水旱，終有收成。若無閑田，此最良法。

第五條：

桑麻之務，衣服所資，切須多方栽種，趁時科耨，自然氣脈全盛，葉厚稭長，飼蠶績縷，皆得其用。又栽桑之法，務要坎坑深闊，蓋桑根柔弱，不能入堅，又不宜拳曲難舒。根既易行，三年之後，即可採摘。

「教化」方面例如第十二條：

或有頑不率教，惰農自安，背本趨末，敗壞淳風，朋游群飲稱曰事情，釀酒屠牲指為口願，田務方集，耽樂城市，其或別生事端，遭值官司，父兄親戚，理須營救，豈止破壞家產，田產轉成荒廢，此等竊當禁止，毋得輕犯。<sup>58</sup>

第一條、第五條，提供的是比較具體的耕作知識，第十二條則是教化勸諭。王惲撰寫這篇勸農文的時間，應不會早於至元十四年（1277）。因為這篇〈勸農文〉的前文提到「提刑按察司欽奉聖旨，所至勸課農桑」。<sup>59</sup>「提刑按察司」設置於忽必烈於至元六年（1269），作為地方的監察機構，<sup>60</sup>至元十二年（1275），忽必烈移除至元七年（1270）所設大司農司之下的隨路巡行勸農官，把巡行勸農的工作併入

<sup>57</sup>（明）宋濂等，《元史》，卷167，〈王惲〉，頁3933。

<sup>58</sup>（元）王惲，〈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6冊，卷195，頁577-578。

<sup>59</sup>（元）王惲，〈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6冊，卷195，頁576。

<sup>60</sup>（明）宋濂等，《元史》，卷6，〈世祖〉，頁121。

提刑按察司。<sup>61</sup> 王惲曾於至元十四年（1277）任河南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再遷燕南河北道，十九年（1282）改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二十六年（1289）授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sup>62</sup> 所以判斷王惲勸農文不會早於至元十四年，甚至可能就是至元十四年寫的。又，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設廉訪使二員，正三品，<sup>63</sup>所以原本提刑按察司的巡行勸農成為廉訪司的職責之一。前文敘述王結仕宦經歷，其中於泰定二年（1325）他曾被派為浙西道廉訪使，不過王結赴任途中因病返還，<sup>64</sup>不然他的《善俗要義》或者有助於巡行勸農。至於王惲撰寫〈勸農文〉的動機與依據，下文將會配合《善俗要義》相關問題一起說明。

整體看來，王惲〈勸農文〉和王結《善俗要義》的寫作格式一樣，都是由條例構成。王惲與王結相差四十八歲，雖然同屬北人，但活躍的時段不同，前者從忽必烈時代到成宗時期，後者則是仁宗到順帝即位之初。這裡無法判斷兩人是否認識，或者王結是否看過王惲的勸農文，不過從內容來看，未嘗不能說王結的《善俗要義》也是一種勸農文，其條例式的寫作格式，則與陸元圭等南人短文式的寫法有所不同。應該說，勸農文至少有條例式和短文式兩種寫法，南宋如此，元代亦然，只是短文格式數量遠高於條例格式。又，《善俗要義》與一般勸農文的傳播方式略有不同：《善俗要義》由總管府繕寫成帙，經過審核准許刊行，發給下級單位依樣抄錄，府、縣層層下達，要求「正官、教官、社長、社師人等」按此條例進行宣導；勸農文則是縣官出郊勸農所作，向父老宣讀，各處張貼。

另外可以補充的是，根據學者研究，宋代勸農文具有進步的農業技術、經營指導以及勸諭農民的内容，但是到了元代（至明初），農業技術、經營指導消失了，而維持社會秩序的勸諭則始終存在。<sup>65</sup> 不過以元代北人王惲的〈勸農文〉與王結的《善俗要義》來看，内容不但有勸諭，其農業技術與知識、經營指導仍相當明確。

接著要問，王結《善俗要義》與王惲的勸農文内容為何是條例式的寫作格式？其寫作背景與知識來源為何？又，寫作格式、寫作背景、知識來源三者是否可有關聯？以下繼續探討。

<sup>61</sup> （明）宋濂等，《元史》，卷 8，〈世祖〉，頁 166。

<sup>62</sup> （明）宋濂等，《元史》，卷 167，〈王惲〉，頁 3933-3934。

<sup>63</sup> （明）宋濂等，《元史》，卷 86，〈百官二〉，頁 2180-2181。

<sup>64</sup>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卷 23，〈王公行狀〉，頁 385。

<sup>65</sup> 伊藤正彥，〈元代勸農文小考——元代江南における勸農の基調とその歴史的位置〉，頁 2、9-16。

## 二、寫作背景與農業知識來源

想了解王結《善俗要義》為何能有相當具體的農業知識，除了單純個人興趣的可能，或者可以從兩個方面考慮：一是王結的師承所學，二是元代勸農桑大環境的促成。

首先，從師承來看，王結曾從學於董朴（1232—1316）。董朴，邢臺人，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薦授陝西按察司檢法，不久辭歸，在家講學，隱居五十年。董朴為學「明理為本，篤行為要」，時稱「龍岡先生」，<sup>66</sup>後來補入《宋元學案補遺》〈魯齋學案補遺·道濟門人〉。<sup>67</sup> 邢臺為順德路治所，王結或者是出任順德路總管時求師董朴學經。王結是否從董朴所學得到農業知識？其實這是一個過於直線的思考。因為孔子雖說不如老農、不如老圃，但並非認為農稼不重要，而是強調君子所學首要的是禮義等價值觀念。而這點應是董朴、王結所能掌握的思想，有無傳授農業知識不是重點。雖然檢閱現存六卷的王結《文忠集》中《善俗要義》以外五卷的內容，見不到農業知識的蹤跡，但是以有無資料推論是不正確的。因此以師承獲得農業知識的可能不用考慮。

其次，所謂「元代勸農桑大環境」的促成，即指忽必烈建立元朝以來的農業政策及其相關舉措，由於這樣的大環境，使得王結必要或者有機會接觸農業知識。從這個層面考量，應更具意義。茲分析如下：

### （一）〈勸農立社事理〉

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對漢地已經有相當的理解，他的漢人幕僚也提出「務農桑」、「重農桑」的建議。因此即位之後，視農業發展為治國重點，不論下達政令、設置管理機構，以及藉由監察體系的監督，皆在在顯示其重視程度。

關於農業管理機構的設置，忽必烈於即位的中統元年（1260），先命各路宣撫司選擇通曉農事者充當勸農官，中統二年（1261）設立勸農司。到了至元七年（1270）

<sup>66</sup> （元）元明善，〈翰林修撰致仕董先生墓碣銘〉，（元）蘇天爵編，《國朝文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據四部叢書本影印），卷55，頁14b-15b。

<sup>67</sup> （清）王梓材、馮雲濠輯，《宋元學案補遺》（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據四明叢書約園刊本影印），卷90，頁118a-118b。

二月立司農司，「專掌農桑水利」，同年十二月改司農司為大司農司並添設巡行勸農使，表示該機構地位之提高。<sup>68</sup> 另外，隨著至元七年司農司的設置，同年也發佈十四條〈勸農立社事理〉，<sup>69</sup>十四條的內容包含立社、農田、水利、樹藝、漁畜、教化、救荒、管理、考核等等農業發展相關的措施。<sup>70</sup> 這十四條的重要性在於「對農業生產的各方面都作了具體規定，可以說是元朝政府管理農業的綱領性文件，後來一再重申」，<sup>71</sup>例如至元二十三年（1286）就再次頒布。<sup>72</sup> 「立社」之「社」，即前文曾言「社」是元代社會基層組織「農村社制」，社眾推舉年高通曉農事者為「社長」，專務勸農。因此元朝「社制」主要作用之一，就是督導農業、促進農業生產，從而穩定社會。從設置司農司到立社，皆說明元廷對於農桑的重視，而〈勸農立社事理〉也成為地方官具體執行的依據。

元廷每每對地方官員、社長等耳提面命，必須用心於農事。例如《元典章》〈戶部〉至元十年（1273）三月忽必烈降旨：

……今降聖旨，委大司農司依舊分布勸農官巡行勸課農桑，興舉水利，舉察勤惰。  
仰各路大小官員、社長人等，照依已降聖旨條畫，依時用心勸課，興舉一切種養、栽植、桑棗、水利、學校等事，須要成功，具申大司農司及合干部份。……<sup>73</sup>

又，〈聖政〉收錄「勸農桑」聖旨詔書八條都一再提醒勸課農桑。像是成宗大德七年（1303）三月：

農桑衣食之本，比聞勸農官司率多廢弛，仰依已將條畫，常加勸課，期於有成。<sup>74</sup>

大德十年（1306）五月：

農桑，衣食之本，經費從出。責任管民〔官〕勸課，廉訪司提調。近年往往懈

<sup>68</sup>（明）宋濂等，《元史》，卷94，〈食貨一·農桑〉，頁2354。陳高華、史衛民，《中國經濟通史·元代經濟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頁179。

<sup>69</sup>《元典章》收錄的〈勸農立社事理〉有十五條，《元史》〈食貨志一〉則說「又頒農桑之制一十四條」。學者洪金富、陳高華等人根據《通至條格》、《至正條格》校訂，應是十四條。

<sup>70</sup>石華、張法瑞，〈元代農業管理的綱領性文件——《通制條格》〈勸農立社事理條畫〉相關問題研究〉，《古今農業》，第1期（2006），頁19-27。

<sup>71</sup>陳高華、史衛民，《中國經濟通史·元代經濟卷》，頁180。

<sup>72</sup>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卷16，〈田令·農桑〉，頁457-462。

<sup>73</sup>洪金富校定，《元典章》，第2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頁870。

<sup>74</sup>洪金富校定，《元典章》，第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頁204。

弛，殊失務本裕民之意。照依累將條畫，依時勸課，遊墮者懲戒。……<sup>75</sup>

武宗至大四年（1311）三月登寶位詔書：

農桑，衣食之本。仰提調官司申明累降條畫。諄切勸課，務要田籌開闢，桑果增盛，乃為實效。……<sup>76</sup>

以上選擇的引文出現的「條畫」一詞，即條規、法令之意。這裡指的是忽必烈到武宗時期所頒佈有關勸農的法令，其中當然也包括了〈勸農立社事理〉。事實上，王結《善俗要義》第一條「務農桑」就出現「蓋人生所資，惟在五穀布帛，所以累奉條畫，勸民敦本抑末，勸修農業者，以此故也」之語，而學者也指出，王結的《善俗要義》內容和立社令文大致相近，包括一些農業生產的具體知識，<sup>77</sup>加上全篇又是條列式的寫法，因此筆者可以合理假定，《善俗要義》即根據〈勸農立社事理〉的寫作格式與內容基調而來。不過也有些不同之處。例如，就篇幅來看，〈勸農立社事理〉每一條並無標題、每條篇幅相對較多；《善俗要義》除了有自己的要點之外，也把〈勸農立社事理〉的某些條例再細分為數條，並予以標題；有的條例有較詳細的敘述，但篇幅不長。〈勸農立社事理〉和《善俗要義》的閱讀以及執行者都以官員為主，也要求下達到社，由社長發布勸導，所以王結《善俗要義》再細分、使人容易閱讀的寫法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農業知識部分，舉例來說，〈勸農立社事理〉第五條提到養殖的敘述並不多：

近水之家，許鑿池養魚并鵝鴨之類，及栽種蓮藕、雞頭、菱角、蒲葦等，以助衣食。……<sup>78</sup>

到了《善俗要義》則另立「六曰養魚鴨」條，內容有所擴充：

……仰附近河渠有地有力之家，疏鑿池沼，中溜洲渚，求懷子鯉魚及牡鯉魚納

<sup>75</sup> 洪金富校定，《元典章》，第1冊，頁205。

<sup>76</sup> 洪金富校定，《元典章》，第1冊，頁205。

<sup>77</sup> （元）楊訥，〈元代農村社制研究〉，《元史論集》，頁15。

<sup>78</sup> 洪金富校定，《元典章》，第2冊，頁872。



於其中，二年之後，其利無窮。鴨尤易養，無所不食，水傍育之，滋孕蕃息。  
更有可栽種蓮藕、蒲葦、菱角、雞頭去處，亦仰多廣栽植，亦治生量法也。<sup>79</sup>

另外，王惲〈勸農文〉應該也同樣受到〈勸農立社事理〉的影響。王惲曾於至元十四（1277）年任河南北道提刑按察副使，而早在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下令成立諸道提刑按察司，巡行勸農為其工作之一，並負有監察之責。其〈勸農文〉提到：

提刑按察司欽奉聖旨，所至勸課農桑，使職近緣巡歷，考照簿書，其耕播栽植之事，勤惰勸率之方，大抵虛文，多失實効。<sup>80</sup>

意即提刑按察司監察勸課農桑一事，往往流於「考照簿書」的表面功夫。為了真正落實勸課農桑，王惲於是寫了這篇〈勸農文〉，希望達到勸農目的：

仰所在有司，照依已降條畫，遍歷鄉村，奉宣聖天子德意，敦諭社長、耆老人等，隨事推行，因利而利，察其勤惰而懲勸之。所有事條，開列如後……<sup>81</sup>

這裡「照依已降條畫」指的應即〈勸農立社事理〉。換言之，可以認為王惲也是依據〈勸農立社事理〉寫出他的〈勸農文〉十三條例，並且在〈勸農文〉之後更以〈勸農詩〉濃縮每一條的內容，每一詩句有一個標題，<sup>82</sup>方便口誦記憶。

總之，不論王結的《善俗要義》或王惲的〈勸農文〉，其寫作格式都可認為根據〈勸農立社事理〉條畫的寫法，而兩篇內容雖然有所差異，但是基調也同樣來自於〈勸農立社事理〉。因此，認為王結的《善俗要義》或王惲的〈勸農文〉是地方基層版的〈勸農立社事理〉或並不為過。

## （二）《農桑輯要》

〈勸農立社事理〉既然是王結《善俗要義》內容基調與寫作格式的依據，那麼

<sup>79</sup>（元）王結，《善俗要義》，（元）楊訥點校，《史學指南（外三種）》，頁437。

<sup>80</sup>（元）王惲，〈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6冊，卷195，頁576。

<sup>81</sup>（元）王惲，〈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6冊，卷195，頁576。

<sup>82</sup>（元）王惲，〈勸農文〉，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6冊，卷195，頁578-580。這些標題有：總論、冀田、種桑、勤鋤、水利、女工、訟田、結親、讀書、省訟、畏法、屠宰、鬪毆、教唆、盜賊、飲博、安分、天報、終勸。

《善俗要義》中的農業知識是否有所根據？這根據則可以《農桑輯要》為首要考量。

至元七年（1270）忽必烈改司農司為大司農司，為了加強「田里之人」的農桑技術以提高生產，該司於是「徧求古今所有農家之書，批閱參考，刪其繁重，摭其要切」，主要由孟祺、暢師文、苗好謙等人編成《農桑輯要》一書，頒布天下，成為有元一代推展農業的基本指引。<sup>83</sup>《農桑輯要》是中國現存最早由官方編撰的農書，全書內容大部分引錄以前的農學著作，除了三、四卷專門探討養蠶，其餘大致與《齊民要術》前六卷相似，但是敘述較為簡要；其他引錄則有《務本新書》、《士農必用》、《四時類要》、《韓士直說》、《種蒔直說》、《博聞錄》、《蠶桑直說》、《農桑要指》、《蠶經》、《歲時廣記》、《野語》等，都是已經遺佚的農書，有賴《農桑輯要》的引用而保存了一部分。<sup>84</sup>全書七卷二十目。<sup>85</sup>

《農桑輯要》成書於至元十年（1273），鑄為版本，進呈世祖忽必烈，且刊行四方；<sup>86</sup>至元二十三年（1286）六月亦「詔以大司農司所定《農桑輯要》書頒諸路」。<sup>87</sup>以後《農桑輯要》時有重刊頒布，具有宣示與落實重農的目的。例如，仁宗延祐二年（1315）八月，「詔江浙行省印行一萬部，頒降有司遵守勸課」；<sup>88</sup>英宗至治改元之際（1321—1322）復印一千五百帙；<sup>89</sup>文宗天曆二年（1329）「頒行《農桑輯要》及《栽桑圖》」，<sup>90</sup>文宗至順三年（1332）又有印行；<sup>91</sup>順帝至正二年（1342）「頒《農桑輯要》」。學者更根據相關資料，整理從忽必烈至元十年（1273）到順帝至正二年（1342）刊行的《農桑輯要》約有萬部，由中央官員以及各道肅政廉訪司、勸

<sup>83</sup>（元）王磐，〈農桑輯要序〉，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2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版第3次印刷），卷61，頁246。

<sup>84</sup>石聲漢，《石聲漢農史論文集》，頁36-39。

<sup>85</sup>這裡使用的是馬宗申以「元刻大字本」譯注的《農桑輯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二十目依次為「典訓」、「墾耕」、「播種」、「栽桑」、「養蠶」、「蠶事預備」、「修治蠶室等法」、「變色、生蚊、下蚊等法」、「涼暖、飼養、分抬等法」、「養四眠蠶」、「蠶事雜錄」、「簇蠶繅絲等法」、「瓜菜」、「果實」、「竹木」、「藥草」、「孳畜」、「禽魚」，最後為「歲用雜事」。

<sup>86</sup>（元）蔡文淵，〈農桑輯要序〉，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46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1版第1次印刷），卷1416，頁29。

<sup>87</sup>（明）宋濂等，《元史》，卷14，〈世祖本紀〉，頁290。

<sup>88</sup>（明）宋濂等，《元史》，卷25，〈仁宗本紀〉，頁531。

<sup>89</sup>（元）蔡文淵，〈農桑輯要序〉，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46冊，頁29。

<sup>90</sup>（明）宋濂等，《元史》，卷33，〈文宗本紀〉，頁730。

<sup>91</sup>（清）永瑢、紀昀等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頁77-78（2075-2076）。〈子部·農家類·農桑輯要〉提要「《永樂大典》又載有至順三年印行萬部官牒」，也就是把印書官員的名字記錄下來。

農正官以大字本頒行，做為勸農之指導。<sup>92</sup>

《農桑輯要》不但由中央主導刊行，地方官員也強調主動印書。熊禾（1253—1312）曾為地方所刻印的《農桑輯要》作序，說到：

右《農桑輯要》一編，迺大司農司頒行之書也。前建安郡丞張侯某刻而傳之，將以廣朝廷務農重本之意於天下。誠使家置一本，奉行惟廛，則人人衣食以足，而風俗可厚、教化可興矣。……<sup>93</sup>

蒲道源（1260—1336）亦為地方所印《農桑輯要》寫序，他說：

……擇能吏楷正農書，……主者頒于郡縣。城固達魯花赤黑閣公，時領農事，謂同署曰：「此聖天子惠養元元之善政。天日煥然，使民家有是書，則耕者盡地利，蠶者富蠶絲，不待春秋巡督，而勸課之效已具于目前矣。豈非事簡而功著乎！」縣尹康公、簿尉文寶，二宰共成其志，資以奉金，鳩工鏤梓，不踰月而告畢。……<sup>94</sup>

所以，《農桑輯要》不但是由中央政府頒布的給地方官員勸農的「欽定教材」，地方也以刻印或抄錄的行為強調對《農桑輯要》的重視與使用。而且各地的復刻、重刊本，更考慮到攜帶便利考量而以小字本刊行。<sup>95</sup> 另外，從熊禾、蒲道源的序言還可以看到存在「如果家家戶戶都能有一本《農桑輯要》，那麼就可以達到勸農成效」這樣的觀念。當然這個觀念是否正確是個問題，因為有書並不等於百姓都能實際運用其中的知識來耕作。不過以地方官員的職責來說，印書分送是落實勸農的具體方式。

從中央政府頒布並印行勸農的「欽定教材」，以及地方官員主動印書的兩種狀況來看，王結以《農桑輯要》當做農業知識的來源，是可以想見的。特別是仁宗延

<sup>92</sup> 宮紀子，第8章「バウルチたちの勸農政策——『農桑輯要』の出版をめぐって」，《モンゴル時代「知」の東西》，上冊（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8），頁361-373。

<sup>93</sup> （元）熊禾，〈農桑輯要序〉，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18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第1版第1次印刷），卷587，頁535。

<sup>94</sup> （元）蒲道源，〈農桑輯要序〉，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21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第1版第1次印刷），卷653，頁213。

<sup>95</sup> 宮紀子，第8章「バウルチたちの勸農政策——『農桑輯要』の出版をめぐって」，頁401。

祐二年（1315）大量重印《農桑輯要》的舉動，對身為仁宗人馬的王結必定有所響應，擁有此書並不意外。王結在第一條「務農桑」即說到：

今後仰社長勸社眾常觀農桑之書，父兄率其子弟，主戶監其田客，趁時深耕勻種，頻併鋤耨，植禾藝麥，最為上計。……蠶桑之事，自收種浴川生蛾餵飼以至成繭繰絲，皆當詳考農書所載老農遺法，尊而行之。

這「農桑之書」、「農書」指的就是《農桑輯要》，學者認為王結對此書「實際上有如金科玉律般的使用」。<sup>96</sup>

就性質與內容而論，作為農書《農桑輯要》當然遠比不是農書的《善俗要義》的農業知識來的複雜、專業許多。前文筆者將《善俗要義》的第一條到十一條區分為「農事」類，其中第二條「課植栽」、第四條「育牝牯」、第五條「畜雞豚」、第六條「養魚鴨」以及第九條「治園圃」的農業知識都有引用《農桑輯要》的痕跡。例如第二條「課植栽」出現「栽桑之法，其種堪移栽、壓條、接換」之句，<sup>97</sup>沒有其他說明，而這句其實是出於《農桑輯要》第三卷「栽桑」中所教導桑樹的栽種方式，有移栽、壓條、栽條、修蒔、科研、接換這些步驟，每一項都詳加敘述。<sup>98</sup>

養殖方面，《善俗要義》第四條「育牝牯」、第五條「畜雞豚」與第六條「養魚鴨」主要來自《農桑輯要》的第七卷「孳畜」與「禽魚」，教導如何養殖馬、牛、羊、豬、雞、鵝、鴨、魚、蜜蜂。二書比對，《善俗要義》將豬、雞飼養合併敘述：

……且五牯之中，雞豚易置。豬種取短嘴無柔毛者良，若近山林，宜多豢養放牧；地面窄隘去處，隨宜養牧。雞種取桑落時生者良，一雄可將四五牝雞籠內著棧，如法畜養。……<sup>99</sup>

《農桑輯要》則分別細論：

豬

<sup>96</sup> 宮紀子，第8章「バウルチたちの勸農政策——『農桑輯要』の出版をめぐって」，頁377。

<sup>97</sup> （元）王結，《善俗要義》，（元）楊訥點校，《史學指南（外三種）》，頁345。

<sup>98</sup> （元）大司農司，馬宗申譯注，《農桑輯要》，卷6，頁95-140。

<sup>99</sup> （元）王結，《善俗要義》，（元）楊訥點校，《史學指南（外三種）》，頁346-347。

〔《齊民要術》〕：母豬，取短喙無柔毛者，良。喙長則牙多；一廂三牙已上，則不煩畜，為難肥故。有柔毛者，焰治難淨也。牝者，子母不同圈。子母同圈，喜相聚不食，則死傷。牡者同圈則無嫌。牡性游蕩，若非家生，則易浪失。圈不厭小。圈小則肥疾。處不厭穢。泥汙則避暑。亦須小廄，以避雨雪。……<sup>100</sup>

雞

〔《齊民要術》〕：雞種，取桑落時生者良。形小、淺毛，腳細短者是也。守窠少聲，善育雛子，春夏生者則不佳。形大，毛羽悅澤，腳粗長者是；游蕩饒聲，產乳易厭，既不守窠，則無緣蕃息也。雞，春夏雞，二十日內無令出窠，飼以燥飯。出窠早，不免烏鴟；與濕飯，則令臍膿也。

雞棲，宜據地為籠，籠內著棧。雖鳴聲不朗，而安穩易肥，又免狐狸之患。若任之樹木，一遇風寒，大者損瘦，小者或死。……<sup>101</sup>

養魚，《善俗要義》說：

仰附近河渠有地有利之家，疏鑿池沼，中溜洲渚，求懷子鯉魚及牡鯉魚納於其中，二年之後，其利無窮。<sup>102</sup>

而《農桑輯要》：

魚

〔《齊民要術》〕：《陶朱公養魚經》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謂「魚池」也。以六畝地為池，池中作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內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內一神守；六月，內二神守；八月，內三神守。「神守」者，鰲也。所以納鰲者，魚滿三百六十，則蛟龍為之長，而將魚飛去；納鰲則魚不復去，在池中，周繞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也。……<sup>103</sup>

<sup>100</sup> (元)大司農司，馬宗申譯注，《農桑輯要》，卷7，頁366-367。

<sup>101</sup> (元)大司農司，馬宗申譯注，《農桑輯要》，卷7，頁369-370。

<sup>102</sup> (元)王結，《善俗要義》，(元)楊訥點校，《吏學指南（外三種）》，頁347。

<sup>103</sup> (元)大司農司，馬宗申譯注，《農桑輯要》，卷7，頁375-376。

《農桑輯要》對豬、雞、魚的敘述原文頗長，所以僅節錄部分，但對比之下，仍可見《善俗要義》的敘述十分簡易。

種植方面也是如此。《善俗要義》第九條「治園圃」提到韭，說：

……且韭之為物，一種即生，力省味美，尤宜多種。<sup>104</sup>

《農桑輯要》第五卷「瓜菜」中的韭菜種植說明不是「一種即生」而已，其實栽種過程頗為繁複：

〔《齊民要術》〕：收韭子，如蔥子法。若市上買韭子，宜試之：以銅鐺盛水，於火上微煮。韭子須更芽生者好；芽不生者是泥鬱矣。治畦、下水、糞覆，悉與葵同。然畦欲極深。韭，一剪一加糞，又根性上跳，故須深也。

二月、七月種。種法：以升盞合地為處，布子於園內。韭性內生，不向外長，園種令科成。薅令常淨。韭性多穢，數拔為良。高數寸，剪之。初種歲止一剪。

至正月，掃去畦中陳葉。凍解，以鐵杷耨起，下水加熟糞。韭高三寸，便剪之。剪如蔥法。一歲之中，不過五剪。每剪杷耨、下水、加糞，悉如初。收子者，一剪即留之。

若旱種者，但無畦與水耳，杷、糞悉同。一種永生。諺曰：「韭者，懶人菜。」以其不須歲種也。《聲類》曰：「韭者，久也，一種永生。」……<sup>105</sup>

除了韭，《善俗要義》第九條「治園圃」還提到其他作物：

……其餘瓜、茄、蔥、蒜等物，隨宜栽植，少則自用，多則貨賣。如地畝稍多，人力有餘，更宜種芋及蔓菁、苜蓿，此物收數甚多，不惟滋助飲食，又可以救饑饉、度凶年也。<sup>106</sup>

<sup>104</sup> (元)王結，《善俗要義》，(元)楊訥點校，《史學指南（外三種）》，頁349。

<sup>105</sup> (元)大司農司，馬宗申譯注，《農桑輯要》，卷7，頁242-243。

<sup>106</sup> (元)王結，《善俗要義》，(元)楊訥點校，《史學指南（外三種）》，頁349。

這些作物，分別出現在《農桑輯要》第五卷「瓜菜」與第六卷「藥草」(苜蓿)；而「隨宜栽植」、「收數甚多」，可以「救饑饉、度凶年」的意見也可見於《農桑輯要》所做的綜合說明。例如芋：

〔《齊民要術》〕：《汜勝之書》曰：……早則澆之，有草鋤之，不厭數多。治芋如此，其收常倍。……《列仙傳》曰：酒客為梁，使烝民亦種芋：「三年當大飢」，卒如其言，梁民不死。案：芋可以救飢饉，度凶年。……〔《務本新書》〕：……芋可以救飢饉，蟲蝗不能傷。……<sup>107</sup>

蔓菁：

〔《齊民要術》〕：……漢桓帝詔曰：「橫水為災，五穀不登。令所傷郡國，接種蔓菁，以助民食。」然此可以度凶年、救飢饉。乾而蒸食，既甜且美。若值凶年，一頃可活百人。<sup>108</sup>

以上不厭冗長的引述與對照，目的即進一步說明：王結《善俗要義》中的農業知識雖然為數不多，但是來自於「奉為金科玉律」的《農桑輯要》是有跡可循的，只是《善俗要義》的敘述予以簡化。《農桑輯要》為大司農司所編的官方農書，以中央之力推廣，作為順德路總管的王結以此書為參考，無需另尋農書，實屬合理。只是《善俗要義》並沒有把《農桑輯要》的每一種牲畜、禽類、魚類和作物的養殖和種植方式都列入，因為《善俗要義》並不是農書，其主要目的不在於提供詳盡的農業知識；欽定教材的《農桑輯要》才是提供詳盡的農業知識的來源。若比較《農桑輯要》、《善俗要義》以及〈勸農立社事理〉中的農業知識，前者本質為農書當然最為詳盡，後者本質為綱領性文件，農業知識最為簡略，而《善俗要義》則介於之間。

最後，可略為一提的是，元代的農學著作當然不是只有《農桑輯要》。《農桑輯要》、王禎（1271—1333）《農書》以及魯明善（1271—1368）《農桑衣食撮要》被認為是元代三大農書，而且當時坊間也仍有《齊民要術》、《務本輯要》等以前農書的刊行。<sup>109</sup> 王結是否也參考《農書》與《農桑衣食撮要》？先以兩書作者的身分、

<sup>107</sup> （元）大司農司，馬宗申譯注，《農桑輯要》，卷5，頁218。

<sup>108</sup> （元）大司農司，馬宗申譯注，《農桑輯要》，卷5，頁226。

<sup>109</sup> 坊間《齊民要術》與《務本輯要》等書的刊行，轉引自宮紀子，第8章「バウルチたちの勸農政策——

編寫以及出版情況來看：王禎是東平人，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擔任宣州旌德（安徽）縣令，大德八年（1304）調任信州永豐（江西）縣令，兩縣任內開始編纂《農書》，分成《農桑通訣》、《百穀譜》、《農器圖譜》三部分，完成於仁宗延祐元年（1314），後來江西儒學副提舉祝將仕牒請刻印。<sup>110</sup> 學者也指出王禎見過《農桑輯要》，所以他的《農書》直接、間接引用《農桑輯要》的許多材料。<sup>111</sup> 魯明善是畏兀兒人，本名鐵柱，仁宗皇慶元年（1312）任安豐路（安徽）達魯花赤，呼應仁宗重刊《農桑輯要》之旨，延祐元年編刻《農桑衣食撮要》，<sup>112</sup>這是一部按照「月令」以事繫月的體制寫成，列舉每個月農家應當做哪些事情的著作。<sup>113</sup>

就時間上來說，王結於仁宗初年出任順德路總管撰寫《善俗要義》，和王禎編成《農書》以及魯明善開始編寫《農桑衣食撮要》的時間差不多，所以他可以馬上見到新編成的《農書》機會很低，也肯定看不到才開始寫的《農桑衣食撮要》。就作者身分來看，以王禎和魯明善的身分所編纂的農書，即使元廷下召刻行，但仍不及大司農司編輯的《農桑輯要》所具有的「欽定教材」官方地位以及中央的極力推廣。因此，即便當時仍有《齊民要術》、《務本輯要》等以前的農書刊行，《農桑輯要》還是王結取得農業知識最方便與最直接的根據。

---

『農桑輯要』の出版をめぐる，討論王禎《農書》部分，引用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祝將仕牒請刻印王禎《農書》：「……雖坊肆所刊舊有《齊民要術》、《務本輯要》等書，皆不若此書之集大成也。……」

<sup>110</sup> 繆啟愉，〈王禎的為人、政績和《王禎農書》〉，《農業考古》，第2期（1990），頁326-327。

<sup>111</sup> 石聲漢，《石聲漢農史論文集》，頁40-41。

<sup>112</sup> 宮紀子，第8章「パウルクたちの勸農政策——『農桑輯要』の出版をめぐる」，頁382；楊鐮，〈魯明善事跡勾沉〉，《新疆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報》，第3期（1985），頁91-92。

<sup>113</sup> 石聲漢，《石聲漢農史論文集》，頁45。



## 伍、結論

現代學者以《農桑輯要》的出版探討元朝的勸農政策，說明元廷對此農書的重視，不僅中央和地方都有重刊出版之舉，也因而帶出了《農書》、《農桑衣食撮要》、《栽桑圖說》等農書，同時配合勸農制度，致力推展農業。<sup>114</sup> 相對的，也有研究指出，元人對司農司、勸農使等勸農制度，有著「勸農實為擾民」、「紙上栽桑」、「官員政績考核實為虛文」等負面評價。<sup>115</sup> 可見中央的勸農政策和具體施行成效其實有一番落差。而從王惲〈勸農文〉到王結《善俗要義》的撰寫動機也都可以看到這個問題。

但是「勸課農桑」畢竟是地方官的重要職責，也是考核的項目，所以該如何貫徹政令達到勸農成效，成為王結上任順德路總管必須面對的問題。他的處理辦法之一，則是撰寫《善俗要義》作為指導，要求下級單位「務要據行，共求實效」，但《善俗要義》不是只有提高經濟生產，其最高宗旨在於「化風俗使清善」，實踐儒家的價值觀念；「富而教之」則是達成的步驟。所以《善俗要義》中包括了「農事」和「教化」兩部分，「農事」則包含了具體農業知識。


《善俗要義》以儒家價值觀為宗旨，而其寫作格式、內容以及農業知識來源，則與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後重視農業，建立各項與農業相關的制度和舉措所形成的大環境相關：至元七年（1270）所頒布的農業綱領性文件〈勸農立社事理〉為《善俗要義》條列式寫法與內容基調的依據；至元十年（1273）大司農司編輯完成的《農桑輯要》則提供了農業知識來源。兩者的共同點，皆在於具有由中央欽定，從上而下貫徹施行的主導地位，所以地方官員的勸農必須遵從〈勸農立社事理條畫〉的規範，農業知識則可以《農桑輯要》為依據。王結的《善俗要義》可見到這兩來源。此外，也可將《善俗要義》視為勸農的操作指導手冊、地方版的〈勸農立社事理〉，

<sup>114</sup> 宮紀子，第8章「バウルチたちの勸農政策——『農桑輯要』の出版をめぐる」，頁326-431。

<sup>115</sup> 王培華，〈元代司農司和勸農使的建置及功過評價〉，《古今農業》，第3期（2005），頁55-63。除了這三項，另有「人力不足」、「畜力不足」、「粗放耕作導致低產低收」、「農時被耽誤」、「農具質次價高農民購買農具費時費力」，屬於勸課農桑中產生的問題，或社會制度因素。

也是條列式的勸農文。作為勸農文，其內容與南宋勸農文內容具有農業技術、經營指導的特徵相近，但不同於消失了農業技術、經營指導，而著重於勸諭的元代江南勸農文。

就農業知識而言，可見到《善俗要義》中的農業知識摘錄於《農桑輯要》，只是簡要許多。這不僅令人思考：王結是否考慮到一般老百姓是否能夠有效理解並運用《農桑輯要》的農業知識，因此撰寫了具體而簡要的指導，使得負責執行勸課的「正官、教官、社長、社師人」更能有效傳達，發揮助力。王結的作法應比其他一般地方官員認為「只要家家戶戶都有一本《農桑輯要》就可以達到勸課農桑」來的深刻，因為他的「勸農桑」不僅指導農稼以增加生產，更有著儒家價值觀的實踐，此之謂「善俗」。

只是《善俗要義》並非如同《農桑輯要》那樣由中央主導、地方配合刊印流通，而可能是局限在王結所治理的順德路，或者揚州路、東昌路頒布。不過，當許多地方官以勸農文或印行發布農書的方式勸農，王結則是進一步撰寫了《善俗要義》，貫徹他的日常勸農。

## 徵引書目

### 一、古籍

- (三國)王弼,《周易注疏》,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0年2月5日。
-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點校本。
- (宋)朱熹,〈勸農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景明嘉靖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0年3月4日。
- (宋)陳傅良,〈桂陽軍勸農文〉,《止齋文集》,四部叢刊景明弘治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0年3月4日。
- (元)大司農司,馬宗申譯注,《農桑輯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元刻大字本。
- (元)王結,《文忠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元)王結,《善俗要義》,收入(元)楊訥點校,《吏學指南(外三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元代史料叢刊。
- (元)楊訥點校,《吏學指南(外三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元代史料叢刊。
-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點校本。
- (元)元明善,〈翰林修撰致仕董先生墓碣銘〉,(元)蘇天爵編,《國朝文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據四部叢書本影印。
- (明)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
- (清)王梓材、馮雲濠輯,《宋元學案補遺》,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據四明叢書約園刊本影印。
- (清)永瑢、紀昀等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
- 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2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版第3次印刷。

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 6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 17、18、21、24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 30、31、36、37、38、46、47、49、51、57、58、59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洪金富校定，《元典章》，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

## 二、專書

### （一）中文

申萬里，《理想、尊嚴與生存掙扎——元代江南士人與社會綜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

石聲漢，《石聲漢農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田建平，《元代出版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知」の東西》，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8。

陳高華、史衛民，《中國經濟通史·元代經濟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

蕭啟慶，《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 （二）日文

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知」の東西》，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8。

## 三、期刊論文

### （一）中文

王培華，〈元代司農司和勸農使的建置及功過評價〉，《古今農業》，第 3 期（2005），頁 55-63。

包偉民、吳錚強，〈形式的背後：兩宋勸農制度的歷史分析〉，《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4 卷第 1 期（2004），頁 38-46。

石華、張法瑞，〈元代農業管理的綱領性文件——《通制條格》〈勸農立社事理條畫〉相關問題研究〉，《古今農業》，第 1 期（2006），頁 19-27。

徐燕琳，〈勸農文學：一種值得注意的文學體類〉，《學術研究》，第 6 期（2011），頁 153—158。

楊鐮，〈魯明善事跡勾沉〉，《新疆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報》，第3期（1985），頁91-96。  
潘清，〈元代江淮流域水利建設述論〉，《學術研究》，第12期（2014），頁105-111。  
繆啟愉，〈王禎的為人、政績和《王禎農書》〉，《農業考古》，第2期（1990），頁326-335。

（二）日文

中島樂章，〈元代社制の成立と展開〉，《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29號（2001），頁119—146。

伊藤正彦，〈元代勸農文小考——元代江南における勸農の基調とその歴史的位  
置〉，《熊本大學文學部論叢・史學編》，第49號（1995），頁1-27。

四、專書論文

（一）中文

丁崑健，〈從仕宦途徑看元代的游士之風〉，收入蕭啟慶編，《蒙元的歷史與文化——  
蒙元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頁635-653。

（元）楊訥，〈元代農村社制研究〉，《元史論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  
頁1-29。

（二）日文

宮沢知之，〈南宋勸農論—農民支配のイデオロギー〉，中國史研究會編，《中國史  
像の再構成—国家と農民—》，京都：文理閣，1983，頁215-253。

（責任編輯：謝佩芳）